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

研究史

李春青 等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

研究史

李春青等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 / 李春青等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328-6026-5

I . 2… II . 李… III . 古典文学—文学理论—文学研
究—中国—20 世纪 IV . I 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2883 号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

李春青 等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48.625 印张

字 数: 83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6026-5

定 价: 8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 一、从“古代文论”指涉的意义范围说起 /1
- 二、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三大类型及其现代命运 /6
- 三、现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之三大路径反思 /14
- 四、当前古代文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反思 /28
- 五、在中西对话中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可能途径 /41
- 六、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 /51
- 七、全球化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 /73

第一卷 清末民初卷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历史脉络之扫描 /78

- 一、子学时代的文学思想和学术传统 /82
- 二、两汉经学视野中的文学思想和学术传统 /88
- 三、魏晋南北朝玄学视野中的文学思想和学术传统 /94
- 四、儒学重建和“文以载道”观的思想内涵 /110
- 五、禅学视野中的文学思想和学术传统 /128
- 六、明代情感论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传统 /136
- 七、清代文化整理视野中的文学思想和学术传统 /142
- 八、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文本形态及影响 /152
- 九、结语 /157

第二章 现代思想文化语境和新的学术范式的形成 /164

- 一、天下体系和天理的解体及其对传统文学思想的影响 /168
- 二、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对传统文学思想的影响 /188
- 三、“群”的社会空间的形成及其对传统文学思想的影响 /202

四、现代个人的诞生及其对传统文学思想的影响 /233

第二卷 20至40年代卷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诞生背景与研究范式的确立 /250

一、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诞生背景 /251

(一)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化背景 /253

(二)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学术背景 /256

(三) 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262

(四)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大学学科制度背景 /265

二、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研究范式及其反思 /276

(一) 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研究范式 /277

(二)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范式的反思 /283

第二章 郭绍虞与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建立 /291

一、郭绍虞所研究的问题及其展开的方式 /292

(一)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梳理 /292

(二) 郭绍虞所解决的几个问题 /298

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307

(一) 郭绍虞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 /307

(二) 郭绍虞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316

三、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局限与困境 /319

(一) 局限与困境之一——文学观念的自我演绎 /319

(二) 局限与困境之二——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轻视态度 /323

(三) 局限与困境之三——传统文化精神的失落 /325

第三章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328

一、罗根泽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展开的方式 /329

(一) 罗著所研究的核心问题 /330

(二)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展开方式 /332

二、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336

(一) 罗著提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范式 /336

(二) 罗著给当代研究提供了反思的参照和契机 /346

- 三、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351
 - (一) 没有处理好求历史之真与求当代之用的关系 /352
 - (二) 现代文论观念的应用具有牵强之处 /353

第四章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356

- 一、朱东润所研究的问题及其展开的方式 /357
 - (一) 朱东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358
 - (二)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展开方式 /360
- 二、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362
 - (一) 提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途径 /362
 - (二) 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领域 /364
 - (三) 在批评家的关系中凸显批评家的个性 /367
 - (四) 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和新文化建设 /368
- 三、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370
 -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不够清晰 /371
 - (二) 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批评家 /371

第五章 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373

- 一、朱自清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展开的方式 /373
 - (一) 朱自清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374
 - (二) 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展开方式 /376
- 二、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378
 - (一) 朱自清的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贡献 /379
 - (二) 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383
- 三、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386

第六章 方孝岳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389

- 一、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问题、贡献与局限 /390
 - (一) 方孝岳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展开的方式 /390
 - (二)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成就与贡献 /393
 - (三)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的局限 /398
- 二、《中国散文概论》中的文论思想 /399
 - (一) 《中国散文概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399

(二)《中国散文概论》的文论意义 /401

第七章 其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404

一、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 /404

二、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 /408

三、古代文论选本和程千帆的《文论要诠》 /411

(一)其他文论选本 /412

(二)程千帆的《文论要诠》 /413

四、相关重要论文 /417

第三卷 建国后卷

第一章 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总体面貌 /430

一、总体研究策略 /430

(一)反思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430

(二)反思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432

(三)反思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内容和框架 /434

(四)反思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434

二、20世纪现代性视角下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模式 /436

(一)拼接模式——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意识 /437

(二)断裂模式——西化或复古意识 /438

(三)政治模式(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文论)——革命的意识 /438

(四)体验模式——当下性意识(历史洞见) /440

三、学术嬗变与文化语境中的古代文论研究学者 /441

(一)古代文论创作主体与古代文论的生存语境 /442

(二)徘徊在知识与意义之间的古代文论研究主体 /443

(三)认同焦虑与文化信心之间的主体追问 /445

四、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反思:语境与模式化 /446

(一)20世纪50至6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语境背景 /446

(二)论俄苏文艺学模式化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 /449

(三)周扬——作为政策制定者的语境关联 /450

(四)建国后大学课程设置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以及教材建

设方面的得失 /454

(五) 当代反思对 50 年代古代文论研究现状的不同评价 /457

五、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古代文论研究的境遇与问题转型 /460

(一) 从革命性到学术性 /460

(二) 从方法论更新到文化意义的追寻 /461

(三) 世纪转型时期的现代性刺激 /461

(四) 古代文论研究从时间/体系到价值/功能的转向 /462

第二章 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的成绩与视角变化 /464

一、古代文论研究的成绩与问题 /464

(一) 古代文论研究的成绩 /465

(二) 古代文论研究反思进程中的问题 /471

(三) 90 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史的特点:理论、学科与文
化 /473

二、90 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内部视角:专注于古代文论学科
本身的研究 /474

(一) 文论史的编写 /475

(二) 专题与范畴研究 /483

(三) 古代叙事文学理论的研究 /493

(四)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494

(五) 作为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代文论研究 /497

(六) 文献的整理 /502

三、90 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外部视角:古代文论研究的崭新
走向 /505

第三章 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重要问题 /509

一、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意义问题 /509

(一) 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背景下的古代文论研究的价
值和意义 /509

(二)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的提出与转换思路 /511

(三) 转换思路的梳理与评价 /514

(四) 关于“现代转换”问题的几个原则问题 /529

二、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530

- (一) 合法性危机的提出 /530
- (二) 合法性危机批判:还有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存在的必要吗? /533
- (三) 合法性危机中的民族性与西方化问题 /536
- (四) 合法性危机讨论的价值和意义及应对思路 /538
- 三、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539
 - (一) 关于研究方法论的总体认识与反思 /539
 - (二) 80年代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实验 /541
 - (三) 成绩与突破:90年代以来比较重要的方法范型 /546
 - (四) 方法论探索上的有效途径和思考原则 /558

第四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两种主要路径 /560

- 一、文化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研究 /561
 - (一) 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 /561
 - (二) 文化诗学问题 /563
 - (三) 文化与文化诗学介入古代文论研究的总体评述 /589
- 二、比较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研究 /591
 - (一)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与文化诗学 /591
 - (二) 90年代以来在比较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研究的贡献 /592
 - (三) 比较诗学在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597

第四卷 海外汉学卷

引论 引介与反思中的双向视域 /602

第一章 朝向综合的诗学之路:刘若愚中国诗学研究述评 /607

- 一、“跨语际理论家”(an interlingual theorist) /608
- 二、语言分析与批评的中国诗学研究 /619
- 三、中国诗学系统化的尝试 /634
- 四、朝向综合的诗学之路 /646

第二章 从比较的诗学到民族的诗学:叶维廉诗学理论述评 /652

- 一、叶维廉的学术生涯与多重身份 /652



- 二、“秩序的生长”:叶维廉的诗学研究之路 /654
- 三、同异全识、互照互识:叶维廉诗学的模子理论 /655
- 四、走向民族的诗学:山水诗·道家美学 /666
- 五、差异与反思:叶维廉的传释学理论 /676

第三章 诗心词质,中西化通:叶嘉莹诗词批评及诗学研究述评 /683

- 一、生平与著述 /683
- 二、“以中化西”的批评方法 /685
- 三、诗歌之本质:兴发感动说 /691
- 四、词学理论的建构 /698
- 五、古典诗学研究:《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 /703
 - (一)对王国维“境界”说的批评 /703
 - (二)对王国维诗学研究方法的批评 /707

第四章 他山之石的搬运者:宇文所安中国诗学研究述评 /713

- 一、以持续的反思提供另外的可能性 /713
- 二、唐诗史研究中的抽象性及其批评 /718
- 三、“文本化”与“中国文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728
 - (一)文本化 /729
 - (二)早期文论及整体性研究的可能 /737

第五章 迂回与进入:弗朗索瓦·于连的中国研究述评 /747

- 一、由“外在”寻求哲学的突破 /749
- 二、中国:由“无关”(indifférence)到相关 /753
- 三、文本的哲学阅读与概念之网 /760
- 四、哲学的傲慢 /765

后记 /769

导 论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内部的事情,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古代文论虽然是一个现代性范畴的文化论域,却毕竟是以古代文学观念为谈论对象的,故而这一研究领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碰撞的一个交会处,成为一个具有多维意义蕴含与象征意味的文化扭结点。古代文论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产物,同时它所具有的种种局限以及今日之困境,也是拜现代性之所赐。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的反思不仅仅囿于古代文论的学科范围,而是通过古代文论来透视中国文化现代性展开过程中若干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

一、从“古代文论”指涉的意义范围说起

什么是“古代文论”?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无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活动,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古代文论”,都与另一个概念,即“文学批评史”基本上可以互换,是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一门学问。如果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算起,这门学问已经走过了 80 多年的历程。关于它产生的原因,朱自清尝言: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得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与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再说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所用的评价标准,起初虽然是普遍的——其实是借用西方的——后来就渐渐参用本

国的传统的,如所谓“言志派”和“载道派”——其实不如说是“载道派”和“缘情派”。文学批评史不止可以阐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与地位。还有,所谓文学遗产问题,解决起来,不但用得着文学史,也得着用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得相当快,这些情形恐怕都有影响。^①

这段话至少包含这样一些意思:第一,古代文论或文学批评史的产生有赖于文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批评在文化系统中地位的提升。第二,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界需要建立崭新的文学评价体系以应对日益蓬勃发展的新文学,古代文学批评因此作为需要清理的对象而受到重视。第三,当时刚刚开始形成的新的文学批评标准起初主要来自西方,后来人们发现本国传统中原有的标准也还是可以用的,为古为今用计,便开始重视古代文学批评。第四,出于整理文学遗产的目的而重视古代文学批评。这些分析是合乎实际的。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可以说是新的文学观念向中国古代的延伸,即用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学遗产,又反过来借用古代文学批评资源建构新的批评观。因此,古代文论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看上去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却暗含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诸多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决定着“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新兴学问的基本形态、演变轨迹与发展走向,对于我们的“反思”来说,这些都是有必要加以辨析与清理的。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或者一个学科门类的古代文论是指伴随着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而产生的,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目的的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研究与其研究主体一样,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古代文论研究主体属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范畴,是一个由传统文人士大夫脱胎而来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古代文论研究则属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范畴,与中国古代的诗文评传统有着根本差异。就是说,尽管作为古代文论这门学问之研究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士大夫存在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文论与传统诗文评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近之处,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存在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就研究主体来看,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士大夫在社会身份、社会功

^①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第5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能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这里且不去管它,对我们的论题有追问意义的问题是:二者在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时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是如何造成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就解答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与传统诗文评话语形态之间的异同问题。

在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古人只是从经验和体验出发对诗文现象有所言说而已——这就是被古人称为诗文评的话语系统。诗文评之所以不同于现代的古文论研究,除了前者建基于古代的“诗文”观念之上,而后者乃是建基于从西方引进的“文学”观念之上以外,更主要的乃在于诗文评是把所言说者作为“份内事”看待,古文论却是当作“别人的事”来看待的。换言之,诗文评的言说方式是“介入式”,即通过体认、涵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切身体会;而古文论却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对象”来审视的,即“对象化”。这种“入思”方式和言说方式上的差异直接导致诗文评永远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形态”,而主要是活泼泼的经验与体验,而古文论则是一种被逻辑思维按照一定规则整理、重构过的概念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古文论这样一种学问,这是一门纯粹的现代学科。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门以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为基础,以概念、逻辑为基本运思工具的现代学科所面对的却是那样一种直接指涉着道德、政教、人格理想、玄妙之思以及活泼泼的感受、体验的特殊话语系统。这种对象与方法的错位必然导致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某种程度的扭曲、改造与遮蔽。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古文论研究某种宿命性窘困,而且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悖论性命运——当你为了保持古代文化的原貌而用古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对其进行研究时,你是在“以古释古”,你的研究根本算不上是现代学术;当你用在西学影响下形成的现代思维和言说方式研究古代文化时,就不可避免地重构古人,根本无法避免“过度阐释”之嫌。我们的现代学术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形成并发展的。在这方面,古文论颇具代表性。

古文论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划定自己言说的范围。比如在郭绍虞那里,是确定“文学观”的含义,并以此为标准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划分历史时期;在罗根泽那里,是为“文学”区分广义、狭义和折中义,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在朱东润那里,则是根据现代文学观念选择值得书写的文论家^①。

^① 章培恒先生以为“美和激情”是“朱先生文学思想的根本点”(见章培恒《〈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导读》),此论确然。“美和激情”是朱东润选择其所评述的文论家的基本标准。这一标准暗含的依据正是“现代文学观念”。

尽管他们在谈论“文学”时看上去是以中国古代材料为依据的，实际上却是预设了西方现代关于“文学”的分类与定义的合法性。这便是他们所说的“与现代社会所用的一样”^①的“文学”或者罗根泽所取的“折中义”的“文学”了^②。因此，郭、罗、朱等前辈学人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也就是用现代文学观念选择、梳理、评介古代文本资料的过程。这种工作的积极意义与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不如此便不足以确立一个独立的学科，也就不能更有效地研究古人的诗文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的相近程度与差异之所在；其二，这种研究梳理出了古人关于诗文之言说的大致脉络与形态。在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方孝岳等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大家所奠定的基础上，数十年来，大批学人花费无穷精力与时间沿着这条路线不断开拓、修补、细化、深化，但始终不出其藩篱。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之功令人敬佩，也值得继续发扬光大。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研究路向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遮蔽了中国古代许多具有独特性的、不能纳入今日之“文学”范畴的诗文观念。例如中国古代的文章学（关于各种文体的规制、体势、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学说）极为发达，但其不属于今日所说的“文学”，故而长期受到古代文论研究的冷落。又如“诗话”、“小说评点”等批评话语虽然一直有大量学者进行研究，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关注其中包含的那些符合现代的“文学”观念内容，而对其运思方式、表述方式则几乎不予理会，因为西方的文学批评从来没有相近的形式。

其次，用现代文学观念为基准衡量古代文论话语，常常导致研究者忽视这些话语产生的具体语境，把它们理解为一种如西方学术话语那样的普遍概念。古代文论话语的产生及使用常常与言说者直接的体验密切相关，故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很大的随机性、灵活性，古人在使用这些话语时是通过上下语境来确定其准确含义的，而不是像西方学术那样多是在普遍性的定义基础上使用某一概念。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做“跨语际”研究的学者可能会有更加突出的感受。刘若愚在谈及自己用英文撰写《中国文学理论》一书的困难时尝言：

首先，在中文的批评著作中，同一个词，即使由同一作者所用，也经常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词，可能事实上表示同一概念……例如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第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一版。



“神”这个字本身可能意指“神明”、“鬼神”、“精神的”、“神圣的”、“神妙的”或者“神奇的”，“韵”这个字可能意指“谐鸣”、“和音”、“押韵”、“节奏”、“声调”或者“个人风韵”。“神韵”合在一起，在理论上可能以令人迷惑的各种方式加以解释，其中有些是合理的，而其余的毫无意义。然而，另一个困难来自有些中国批评家习惯上使用极为诗意的语言所表现的，不是知性的概念而是直觉的感性；这种直觉的感性，在本质上无法明确定义。^①

用西文写作关于古代文论的著作或者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时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对古代典籍展开研究时，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论者常常犯的错误正是力求将那些多义的或含义不固定的、感性的语词解释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误以为此类语词也有着像西方学术话语那样固定不变的内涵与外延。这就是古代文论研究者对那些古代文论语词，诸如“志”、“情”、“气”、“体”、“势”、“风骨”、“意境”、“兴趣”、“神韵”之类绞尽脑汁地寻找其确切含义而总是达不到目的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些语词的含义只能在特定语境中才可以确定，而且这种“确定”往往也只是意味着它们给出某种具体的体验、感觉而不是明确的定义。正如“仁”这个儒学的核心话语，尽管孔子常常使用它，但从不为之下定义，而且每次使用的含义都有所不同。

最后，这种研究有时会忽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复杂性和文化内涵上的丰富性。古代文论话语背后的依托是中国古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理想，与西方文论话语的解释性品格大相径庭^②，但是以西方文学观念为基准来梳理古代文论话语显然就不得不舍弃那些与之相左或者不搭界的内容。这样的研究无疑是遮蔽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资源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例如在玄学语境中产生或使用的那些文论话语，像“淡远”、“飘逸”、“风骨”、“清丽”、“高古”、“虚静”之类总是与当时士人们的人格追求、价值理想有着密切关联，如果把它们单纯地理解为仅仅指涉诗文风格的语词就必然舍弃了其

①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第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② 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西方文论与批评著作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大都来自对研究对象的归纳和抽象，基本上是对文学作品某方面性质的解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却有大量并非从诗文中归纳、抽象出来的语词，它们来自另外某个话语系统，例如先秦诸子哲学中许多语词在六朝之后转换为文论语词（“道”、“神”、“妙”、“玄”、“气”、“清”、“风”、“雅”、“味”、“意”等等）。它们虽然成为文论语词，在语义上有所变化，但其原本具有的那些指涉人格境界、人生理想等方面的文化意味却并未丧失。

丰富的文化意味。

二、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三大类型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评话语系统。下面就这三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第一,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这派文论观念一直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就现存《诗经》作品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利——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根据《诗经》我们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的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决定的。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

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这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相应出现一些新的特征。经过魏晋六朝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